|  |  |  |
| --- | --- | --- |
| Macintosh HD:Users:bilodeau:Desktop:logos:template 2017:un.emf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预发本 CBD** |
| **CBD_logo_ch-CMYK-black [Converted]**  |  | Distr.GENERALCBD/SBI/3/5/Add.2/Rev.18 December 2021CHINESEORIGINAL: ENGLISH |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第三次会议（续会）

日期和地点待定

议程项目6

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资源估算

资源调动问题专家小组第二次报告：最后报告

* 1. **导言**
1. 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在关于资源调动的第[14/22](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22-zh.pdf)号决定第14段申明，资源调动将是由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十四届会议决定完全按照2020年后框架总体进程，在框架制定进程的早期阶段开始这一组成部分的筹备工作。缔约方大会在同一决定第15（c）段责成一个资源调动问题专家小组：

估算实施2020年后框架不同情景所需各方面来源的全部资源, 同时顾及全球环境基金的需求评估以及2020年后框架实施工作所产生的成本和效益。

1. 根据这一决定，本文件提供专家小组关于这一专题的最后报告，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审议。文件还将提供给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续会，以便在其工作中酌情予以考虑。
2. 2019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详细描述了过去50年里，由于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的加速，自然及其对人类的贡献如何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恶化。此期间在资源分配上，有害生物多样性的支出远远超过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支出。[[1]](#footnote-1) 因此，评估这一恶化的经济影响，调动扭转这一趋势所需的资源，实属至关重要。
3. 为了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必须充分调动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承付生物多样性政策、方案和项目的所有来源的资源数量。提高资源水平并不能保证提高保护水平，但研究显示，平均而言，划拨更多资源给生物多样性方案和项目与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关系。[[2]](#footnote-2)
4. 本文件概述对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或框架组成部分所需资金已经完成的分析、基本方法和得出的估算数(第四节和第五节)。应该指出的是，本文件并不打算估算执行现有框架草案具体提案所涉费用。相反，根据审查各种情景的任务规定，文件为2020年后可能需要作出的总体努力或这些努力的子集提出了若干不同费用估计数。它还审视不同情景设想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潜在成本和效益（第三节）。第二节载有主要信息，第七节提出最终结果和讨论。
5. 本文件收入对资源需求的几项不同分析，列出相关方法和最新估计数。康奈尔大学（美利坚合众国）John Tobin教授领导的分析（根据《自然融资：弥合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的报道）是基于对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生物多样性关键经济部门必需开展的活动和投资所累积的资源需求的估算。分析计算到2030年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区域、养护沿海和城市地区、管理入侵物种以及将关键经济部门转变为可持续部门所需资源的净现值。分析提供了一系列全球年度估计数，其中包括实施保护项目的财务成本，但也包括改变经济部门做法所产生的收入损失（机会成本）。
6. 剑桥大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nthony Waldron教授领导的第二次分析按照在一个多种经济部门竞争土地和海洋区域的总体经济框架中把保护区从目前的水平（15%的陆地面积和7%的海洋面积）扩大到2030年的30%的设想，预测2040年和2050年的经济成果。分析估算了保护区的年度投资以及农业、渔业和自然旅游部门的预期收入，还考虑了生态系统服务增加带来的减少风险的净效益、提高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土地保护水平带来的社会效益以及扩大保护区带来的补偿成本。补偿成本或机会成本表示实施生物多样性项目或活动的直接财务成本之外，就潜在经济利益损失而言，因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产生的收入损失。
7.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Ivo Mulder和Aurelia Blin领导的第三项分析[[3]](#footnote-3) 估算了为实现里约三公约[[4]](#footnote-4) 下的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全球目标，需要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5]](#footnote-5) 进行的投资。尽管这项估算测重于所有三项里约公约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仅针对生物多样性单独估算所占比例，但所使用的方法是基于一个全面和全球公认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了不同的经济主体，最大化其本身效用和对福利变化的隐性补偿，并大体上提供了与本文中的其他分析同等数量级的所需资源估计。
8. 所有分析都明确或隐晦地将某种类型的补偿成本或机会成本列入了估算。从福利角度看这些成本应予考虑，但它们不一定“转化”或完全转化为直接的财务成本，亦即为采取措施支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而需要筹资的财务资源。列入这类成本必然导致更高的估计数。但是基于扩大保护区的第二项分析把估算分为包括补偿成本和不包括补偿成本，方便考虑资金需求的下限。
9. 第五节介绍专家小组为补充先前的分析而进行的分析。专家小组的分析使用统计模型，根据《公约》财务报告框架中报告的信息估算每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支出和资金需求，[[6]](#footnote-6) 并根据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农业用地的不同水平预测2030年的情景。鉴于此分析基于过去的国别支出以及为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而确认的额外资金需求，它列入的机会成本仅限于已经反映在生物多样性政策导致的利益损失的实际或计划补偿的机会成本中。使用的情景设想隐含一种假设，即这种支付将增加，然而由于财务报告框架中基础数据经过高度汇总，无法量化这种支付的确切份额。
10. 由于成本概念不同，方法也不相同，各估计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如此，如下文进一步所述，各估计数大致指向同一个方向，表明需要从目前的水平大幅增加财务资源，以“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线。
11. 笼统而言，一项保护政策或项目，其增量影响可以从增加自然和人类福祉的角度来评估。为了增加福祉，效益（广义上的效益，不仅仅是商业或金钱效益）必须超过成本。本文件审视了最新进行的分析，这些分析按照生态系统服务估值和从目前水平扩大保护区，评估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保护努力的成本和效益。第一种方法载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未来》报告，[[7]](#footnote-7) 估算三种情景设想下（一切照旧、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保护）到2050年六种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第二种方法是Waldron及其同事使用的，估算上述保护区扩大所需的资源，但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说明为生物多样性投资不仅能给关键经济部门带来巨额财务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带来社会净效益。这些使用最先进方法进行的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如果未来30年采取雄心勃勃的保护措施，将给人类和自然福祉带来巨大好处。相反，行动不足会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
12. 作为《公约》的融资机制，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是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资源调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根据缔约方大会第[14/23](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23-zh.pdf)号决定的要求，将提供一份关于在全环基金信托基金第八次增资期间执行《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所需资金的全面评估报告，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审议。评估考虑到最新的国家报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和财务报告、缔约方通过第2020-021号通知所附相关问卷提供的信息；[[8]](#footnote-8) 报告的结论是，全环基金第八次增资需要为实现未来目标大幅增加生物多样性供资，并建议考虑到全环基金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发展努力的主流和确保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作用，它在调动资源执行《公约》方面也应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报告还建议全环基金更加注重公约议定书及其与绿色气候基金之间的联系，以促进为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多资金。

**二. 主要信息**

1. 目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雄心显然不足。审视过的所有分析都表明，如不能筹集到足够资源来有效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框架，不能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将会造成巨大的全球经济成本。纯粹从经济角度看，仅靠维持目前用于保护的供资水平将导致经济损失。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未来》报告保守估计，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每年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占全球年度GDP的0.67%）。相比之下，仅为到2030年把保护区面积扩大30%投资这一项，估计未来全球农业、渔业和自然旅游部门的收入将超过必要的全球投资。即使现阶段可用的信息和数据有限，但有令人信服的经济论据表明应分配更多资源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框架不仅有可能改变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即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曲线），还可为今世后代带来巨大的净经济效益。
2. 本文报告的对未来资金需求数额的估算相差很大，较低的每年1,030亿至1,780亿美元，较高的每年5,990亿至8,230亿美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a）相关类型成本的概念不同（狭义或广义），特别是财务成本和机会成本，后者大大提升总成本；（b）生物多样性支出或投资的概念不同（狭义或广义）；（c）纯属方法上的不同（见下文）。鉴于这些不同，应对每一估算数额分别进行剖析解读。
3. 较低全球估计数额（每年1,030亿至1,780亿美元）仅基于到2030年将陆地和海洋保护区面积从目前水平增加到30%所需的投资（不考虑任何补偿成本）。这相当于目前支出估计数额（每年245亿美元）的4.7至7.3倍。所用方法是估算未来情景设想，包括管理投资、新建保护区和补偿成本。补偿成本仅用于福利分析。使用了发达国家保护区每公顷的当前预算来估算未来扩大保护区的资金需求，但未计2030年后管理效率的提高。
4. 相比之下，较高全球估计数额（每年5,990亿至8,230亿美元）基于每个重点活动的供资，使用了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相关支出的广泛整体概念。它估算到2030年保护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将农业/渔业/林业部门转变为可持续部门、保护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入侵物种、保护城市水质所需要的资金。它采用了更广泛的经济成本概念，还考虑了未来三至四年内将这些关键经济部门转向可持续生产而维持相同生产和收入水平所产生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表示实施生物多样性项目或活动的直接财务成本之外，就潜在经济利益损失而言，因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产生的收入损失。列入这些机会成本必然导致较高估计数额。而仅考虑直接财务成本可能导致较低估计数额，因为仅改造农业部门（农田和牧场）一项就需要支付3,960亿至5,01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补偿。
5. 此外，列入机会成本遇到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机会成本很可能是根据在奖励方面维持现状的假设来计算的，其中包括大量负面环境外部因素和大量有害生物多样性的补贴；据估计在经合组织成员国[[9]](#footnote-9)，仅农业一个部门，这类补贴平均每年达1,000亿美元。由于这些原因，观察到的价格信号已被扭曲，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导致高估机会成本。因此，专家小组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报告不仅强调了减少或消除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的重要性，还强调了尽可能将补贴转用于加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6. 还有一个估计数额（每年1,510亿至1,820亿美元）[[10]](#footnote-10) 基于专门为本报告进行的分析，使用缔约方在其财务报告框架中报告的支出和资金需求数据，根据各国在财务报告框架中提供的数据，推算不同情景设想下的资金需求。[[11]](#footnote-11) 它的优点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根据缔约方报告的数据预测资源，从而反映国家特点。因为基于NBSAP，缔约方通过财务报告框架表明的资金需求可以说是基于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支出这一更广泛的概念，并且仅在机会成本已经反映在实际财务支出的情况下才将其列入。另一方面，这种分析的局限性在于，现有的NBSAP总体上可以说没有反映出《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雄心大志。[[12]](#footnote-12)
7. 总体分析显示，走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所需财务资源大大低于走一切照旧的道路。这符合专家小组第一次和第三次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其中强调应变革社会和经济制度，并提出基于三个核心组成部分的资源调动战略办法:（a）减少或转用有害生物多样性的资源；（b）从所有来源筹集更多资源以实现《公约》的三个目标；（c）提高资源使用的成效和效率。
8. 此外，不仅需要集中力量从全球所有来源为生物多样性筹集资金，还需要集中力量处理具体的融资机制和分配问题。正如《全球未来》和IPBES报告所示，并非所有区域都从增加保护投资中获得同样的利益或同样的机会成本。例如，Droste等人（2019年）[[13]](#footnote-13) 提出了一个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以便通过政府间转让分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财务负担。这一机制以财政平衡原则为指导：谁受益谁付费。[[14]](#footnote-14) 这基本上是全环基金在资源分配中采用的增量成本推理的一种应用。[[15]](#footnote-15)
9. 如上所述，尽管目前正在努力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本、效益和资金需求，但仍需要更多的数据和研究来准确评估资源调动及其效益。例如众所周知，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支出远远高于有益的支出。[[16]](#footnote-16) 减少或消除这些有害支出将节省此类支出，但也产生短期成本，例如对依赖这些支出的社区而言。这些成本有多高？消除一定数量的有害补贴能带来多大的生物多样性效益？量化这些影响，搞清消除有害支出的增量效益和增量成本，是进一步研究的当务之急，以便为紧急行动提供信息。

**三. 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产生的成本和效益**

1. 2019年IPBES《全球评估报告》提醒我们，人类驱动的压力正在如何影响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受间接驱动因素影响，如人口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以及相关的技术发展，许多未来情景设想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负面趋势预计将继续或恶化。《全球评估报告》提出了五项主要干预措施，通过解决自然恶化的潜在间接驱动因素达成变革。[[17]](#footnote-17) 实施这些干预措施将需要资金。
2. 正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未来》报告（2020年）所示，生态系统功能继续恶化，目前的保护和资源调动水平不够宏伟。假如一切照旧，从2011年到2050年，自然的丧失会给世界经济造成累计损失9.9万亿美元（按贴现值计算）。这等于到2050年每年损失4,790亿美元，或全球GDP每年下降0.67%。发展中国家将承担这一成本的最大份额。
3. 这个估计数额考虑了六个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沿海保护（每年损失3,270亿美元）；碳储存（每年损失1,280亿美元）；产水量（每年损失190亿美元）；授粉（每年损失150亿美元）；森林生产力（每年损失80亿美元）；鱼类生产力（每年增加170亿美元）。然而如果把30%的陆地、海洋和沿海地区置于一个全面、生态连贯、管理有效的保护区网络的保护之下，根据《全球未来》报告的全面保护情景设想，累积效益将达2,300亿美元或每年113亿美元（到2050年占全球GDP的0.02%）。这两种情景设想的GDP相差0.69%，代表保护带来的净收益。情景设想结果之间巨大的负向不对称性或偏度表明，如果世界想要正面的经济影响，就必须采取雄心勃勃的保护措施。
4. 《全球未来》的分析涵盖140个国家，采用最先进的模型，将InVEST 估价模型[[18]](#footnote-18) 与GTAP模型[[19]](#footnote-19) 相连接，评估三种发展情景设想下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和相关土地使用变化产生的经济影响。这三种情景设想—“一切照旧”、“可持续发展途径”、“全面保护”—基于IPBES《全球评估报告》和“共享社会经济途径”（SSP）情景设想。[[20]](#footnote-20) 建模工作包括根据共享社会经济途径驱动因素界定土地使用设想，评估驱动因素如何影响自然资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界定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活动，计量这些变化的经济影响。
5. 这种方法有一定局限性，使得估算结果偏于保守。对自然提供的许多生态系统服务，人们掌握的数据有限。这将导致低估结果，对那些主要生态系统服务或与生态系统服务无关的其他生态影响未计入模型的国家造成极大偏差。此外该模型没有考虑因经济活动减少而影响自然资本的所有可能方式，也没有考虑不可逆变化的阈值。不过使用这种方法有一些重要的好处。它考虑全球大多数经济活动和国家。它还包括经济中价格的变化以及缓解低水平生态系统服务冲击的适应和替代效应。当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数量出现冲击时，人们往往会适应并替代这些服务。
6. 除了上述工作，剑桥大学Anthony Waldron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在自然运动和国家地理协会的支持下，估算了将陆地和海洋保护区从目前水平扩大到30%的预期效益和成本。根据他们的估算，在所有预测的情景设想中，实施扩大保护区都将产生净全球财务和社会效益（效益比不扩大保护区大）。[[21]](#footnote-21)
7. 为实现这一点，由各类生物多样性专家建构了一组全球图，然后用7种不同的预测模型创建了12种情景设想，从不扩大保护区（一切照旧）到重分生产部门确定生物多样性的先后次序，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生产的情景设想。使用了四种不同的综合评估模型来估算农业部门的潜在收入。在这些模型中，价格和产量根据一组生产和市场函数而变化，以预测在任何给定时间有多少土地将分配给农作物或畜牧生产。对渔业部门，模型根据保护区捕捞规定估算预期渔获量和渔获价值。对自然旅游部门，模型收集目前保护区网络的游客人数及其收入的数据以及影响游客人数的多种因素，用于开发统计模型预测已知游客人数和收入。一个基于世界各地保护区游客在线发布的统计模型被用来预测2040年和2050年的游客和收入。
8. 就财务效益而言，扩大保护区后每年将从自然旅游、农业和渔业这三个部门产生1,000亿至3,120亿美元的毛收入（不考虑任何机会成本）。所有“扩大”情景设想都优于不扩大设想。此外，扩大不但将避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年度损失，还将因热带森林和红树林面积更大、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更多（例如防止沿海风暴潮破坏、土壤侵蚀、洪水），而产生1,500亿至2,100亿美元的收入。预测收入的差异取决于所选情景设想、基于三个部门的增长率，特别是自然旅游部门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就社会效益而言，预计全球生物多样性灭绝风险将大幅降低，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更多土地（63%至98%，即3,700万至7,000万平方公里）将得到保护。
9. 就实施成本而言，每年所需投资估计在1,120亿至3,900亿美元之间，包括补偿成本（介于90亿至2,120亿美元之间，依情景设想而异）。其中陆地区域为870亿至3,590亿美元，海洋区域为250亿至310亿美元。除补偿成本外，这些投资还包括管理现有保护区和新增保护区所需的适足资金。如果不考虑可被视为一种机会成本的补偿成本，预期投资额将降至1,030亿至1,780亿美元。使用发达国家每公顷保护区的当前预算来估计未来扩大保护区的资金需求，不计2030年后管理效率的提高。假设效率提高，当然会降低预测资金需求。还假设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援助将从目前的水平翻一番，达到全球GDP的0.01%，但在目前流向保护区的资金中仍只占一小部分。
10. 鉴于在经济中自然旅游部门与农业和渔业部门争用土地和海洋，这一分析的主要贡献是显示，扩大陆地和海洋保护区是一个具有经济效率的决定，因为所有这三个部门都可大大提高收入，特别是自然旅游部门（未来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5%至6%）。根据这一分析，扩大保护区的成本不会成为经济的净负担，而是一种投资，可以（a）产生更高的收入，为全球经济作出贡献，（b）减少自然灾害和疾病风险，（c）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土地，减少碳排放，从而增加社会效益。应注意的是，补偿成本往往会大幅增加，因为扩大保护区的情景设想考虑在生物多样性与眼下农业和渔业需求之间搞一个折衷。
11. 所有估算数额都以年度收入和成本列报。报告用很大篇幅解释为什么贴现率和净现值对于这类分析没有什么意义。鉴于在任何时期总收入总是高于成本，贴现这些数值就变得微不足道。以定值美元计算的年收入和年成本的对比才是重要的。
12. 了解扩大保护区工作收益和成本的另一种方法是观察自然资产的投资回报。注重财富和福祉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投资自然资产带来的高回报率。《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论》[[22]](#footnote-22) 将自然视为一种资产，如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主张更可持续和更有效地管理所有资产，以改善人类财富和福祉。因此，该《评论》试图将生物多样性视为组合资产管理问题的一部分，以此来理解和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它展示了人类是如何植根于自然而不是置身事外，以及人类的福祉是如何依赖自然的。
13. 如果通过组合资产管理框架看待自然，人类没有做到可持续地管理其全球资产组合。例如，在过去30年里，自然资本存量下降了40%，而人力资本仅增加13%。由于没有在社会中体现出自然的价值，即没有将其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对包括自然在内的全人类资本的管理一直效率低下，正在危及今世后代的福祉。这方面管理不善不仅表明市场失灵，也是制度失灵。世界各国政府付钱给人们更多是为了开发自然，而不是保护自然。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隐性补贴，使每年破坏自然的补贴总成本达到约4万亿至6万亿美元。[[23]](#footnote-23)
14. 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迫切需要是拟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出发点。《达斯古普塔评论》断言，需要立即采取额外行动来维持目前低水平的生物多样性完整性，而要将生物多样性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估计累积社会成本将达7万亿美元。如将必要的投资推迟十年，意味着这些社会成本将增加一倍，达到15万亿美元。《评论》还提出了纠正失衡的不同方法:(a)确保人类对自然的需求不超过其供给，增加相对当前水平的供给。现在保护自然比以后恢复被破坏的自然更便宜，今天就投资回报率也高；(b)改变衡量经济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由于国内生产总值不计算自然折旧率，因此有必要将自然资本纳入全球和地方核算系统；(c)改变全球金融和教育体系，以最佳方式管理和减轻不可持续的自然管理带来的风险。
15. 最后，资源调动问题高级别小组2014年第二次报告[[24]](#footnote-24) 所提建议仍然有效。该报告有力地说明了世界各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是如何产生巨大净效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不仅加强了脆弱社区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还提供了抵御不确定和未来环境变化的保险，有助于减缓、适应和复原气候变化。报告通过几个案例展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货币和非货币效益如何超过成本。报告的结论是，“生物多样性行动所需的全球人均投资介于20至60美元之间。[[25]](#footnote-25) 这意味着投资需求占全球GDP的0.08%至0.25%”。鉴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综合价值，又鉴于上文提到的《全球未来》报告所估算的，在一切照旧和全面保护两种情景设想之间，预期净收益为GDP的0.69%，投资生物多样性很可能为人类带来净收益。
16. 从评估过的所有方法来看，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全球经济代价是巨大的。即使现有数据有限，但一个宏伟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调动办法不仅可能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线，而且可能为今世后代带来净经济效益。

**四. 目前为筹集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资源而开展的工作**

1. 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或框架组成部分的资金需求估算的最新分析由剑桥大学的Anthony Waldron和康奈尔大学的John Tobin分别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尽管得出的估计数额不相同或不可直接相比，但两项分析都给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需资金的相关见解。此外，环境署的Ivo Mulder和Aurelia Blin估算了为实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全球目标(根据里约三公约)而需要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进行的投资。这一分析为估算所需资金的规模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补充视角。
2. 作为上一节所述保护区全球预测的一部分，Waldron及其同事估算了到2030年将全球陆地和海洋保护区从目前水平扩大到30%所需的资源。为了估算扩大面积所需的投资，收集了发达国家现有保护区每公顷的预算需求数据，例如提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保护区系统需求“资金记分卡”。利用这些数据建立了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的统计模型，根据现有保护区的特有情况，如农业租金、人类压力、治理、人均GDP、偏远程度、规模经济等，预测每公顷保护区的支出。然后假设2030年后管理效率没有提高，使用这些回归预测每种设想下扩大新保护区的可能预算需求（以2015年定值美元计算）。
3. 根据作者的估算，含有扩大保护区内容的各情景设想每年所需资源从1,030亿到1,780亿美元不等。其中每年676亿美元用于适当管理现有保护区，每年355亿至1,103亿美元用于增加新的保护区，依设想而异。列入补偿成本后（生产损失当地机会成本和自然资源使用者当地机会成本），每年所需资源从1,120亿美元（陆地区域870亿美元，海洋区域250亿美元）到3,900亿美元（陆地区域3,590亿美元，海洋区域310亿美元）不等。各设想中补偿成本的土地价值根据尚未保护的扩大区的农业租金估算。
4. 由John Tobin教授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在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保尔森基金会（自然融资报告）的支持下估算了到2030年实现一项宏伟保护计划所需的资源。这一分析显示，全球估计总额每年在7,220亿到9,670亿美元之间，每年资金缺口估计在5,990亿至8,230亿之间，平均值为7,110亿美元。这一总额基于对六项活动所需资源的分析：（a）到2030年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区域；（b）在三到四年内将三个关键经济部门（农业、渔业、林业）转变为可持续部门；（c）保护沿海生态系统；（d）保护城市环境；（e）持续管理入侵物种；（f）保护城区水质。
5. 具体而言，这项工作旨在确定到2030年扩大保护区—从目前陆地的15%扩大到30%，从目前海洋的7%扩大到30%—所需的资金。据估计这样扩大每年需要大约1,490亿至1,920亿美元。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考虑将关键经济部门（农业、渔业、林业）的现行做法转变为可持续做法的成本。据估计未来10年中，每年需要大约4,380亿至5,800亿美元来改造这些全球部门。分析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考虑保护城市和沿海地区以及保护水质所需的资金。据估计到2030年实现这一目标每年需要约1,000亿至1,100亿美元。最后，持续管理入侵物种的成本估计每年360亿至840亿美元。
6. 为了了解总体资金需求，为每项活动做了几个重要假设。例如对扩大保护区所需资金估算的假设是，重点是保护关键海洋和陆地生物多样性区、迁徙走廊、核心淡水生境以及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的沿海地区。这些估计数所涵盖的范围和Waldron及其同事估计的范围一致。两项估计都表明，用于保护区的资源需要从目前的水平大幅增加。对农业部门，假设为向可持续部门过渡提供收入支持，该部门100%获得付款。付款按每个地区的农业产值（单位为每公顷美元）计算。对渔业部门，根据Mangin等人的假设（2018年）[[26]](#footnote-26)，该部门100%转为基于渔获量控制的管理。把Mangin等人为2012年全球渔业72.4%所报的129亿美元改为100%，按2019年价格计算。对林业部门，把森林可持续管理成本估计为每年每公顷13至21.6美元。森林面积的估计方法是从全球森林总面积中减去保护区（30%）和已经可持续管理的森林（11%）。对入侵物种的管理，根据公约资源调动问题高级别小组第一份报告（2012年）中的假设[[27]](#footnote-27)，把全球贸易增长率假设为2.5%。对海岸保护，只估算红树林、海草和盐沼的恢复。假设红树林继续每年损失0.26%至0.66%，从2000年的73,624平方公里到152,607平方公里，恢复红树林的成本为每公顷10,848美元。假设海草恢复面积为52,100至173,667平方公里，每公顷成本124,934美元，假设盐沼恢复面积为1,831,696至5,495,089公顷，每公顷成本78,540美元。对城市地区，假设41,000至80,000平方公里受到保护，每平方公里成本176至6,794美元。最后，对保护城市地区水质，假设城区90%的水源流域的沉积物和营养物再减少10%。
7. 最大的估算数来自改造农田和牧场的成本（至少占全球需求估计数的50%）。假设全球所有耕地和牧场都将转型，其中没有考虑土地转型的边际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下文将进一步解释这些估计数与第五节中补充分析之间的主要差异。
8. 环境署的Ivo Mulder和Aurelia Blin进行的第三项分析评估了为实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全球目标需要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投资。分析使用了一个全面和全球公认的农业生产及其对环境影响的模型(MAgPIE v4.1)，其中包括不同经济主体最大化其自身效用和对福利变化的隐性补偿。它估计了以森林为基础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林牧复合(在农地上植树)、红树林恢复以及泥炭地保护和恢复所需的投资，从而估计了从一切照旧轨道转向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目标相一致的轨道所需的额外年度投资。
9. 环境署的分析结论认为，每年至少需要4,03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才能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才能降低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碳排放量，并在2035年前变为净负值，才能使生物多样性丧失—超越历史背景率—在2050年前降至零。尽管环境署的估计侧重于所有里约三公约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仅针对生物多样性的比例分开估算是不可行的，但环境署分析提供的估算与先前讨论的其他分析是同等数量级的。

**五. 使用财务报告框架中的数据估算不同情景设想的资金需求**

1. 这一分析旨在使用缔约方在财务报告框架中列报的国内支出和资金需求数据（这些数据载于在线数据库[[28]](#footnote-28)）补充上一节概述的最新需求评估。将数据拟合到一个计量经济模型中，控制各种国家特性，首先估算未使用财务报告框架列报数据的国家的资金需求，然后预测三种不同情景设想到2030年的资金需求（受IPBES《全球评估报告》情景设想的启发）。
2. 使用两种统计方法建立和比较三个模型：由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拟合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两个变型（MLR-1和MLR-2）和一个基于主成分分析（PCA）的模型。MLR-1模型使用文献中以前使用的协变量；然而我们发现多重共线性存在重要问题，可能导致高估，因此使用了一个线性回归变型（MLR-2）和PCA作为系统性解决多重共线性的替代方法。[[29]](#footnote-29) 每个模型都采用相同的六个步骤[[30]](#footnote-30) 来获得未来全球资金需求的预测。CBD/SBI/3/INF/5所载补充文件提供了分析的更多细节。
3. 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国内支出和资金需求数据从《公约》的财务报告框架中收集。2006年至2015年列报了国内支出，来源可能包括各级政府（中央预算、国家预算、地方或市政预算）以及预算外资源、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集体行动。然而并非所有缔约方都报告了所有年份或所有资金来源。2014年至2020年列报了资金需求，但大多数缔约方没有在这一时段报告数据。由于多年数据缺失和失衡，因此取了一个国家所有报告年份的平均值。
4. 这样总共获得国内支出观测值79个，资金需求观测值39。总体而言，33个高收入国家、18个中高收入国家、15个中低收入国家、13个低收入国家在报告框架中列报了国内支出。各收入水平的国家报告资金需求数据的较少：2014年至2020年，9个高收入国家、10个中高收入国家、10个中低收入国家、10个低收入国家至少报告了一个资金需求数据点。从世界银行数据库收集了每个国家15个特征的横截面数据。补充信息所载表1、表2、表3列出了收集的所有数据的数据规格、描述、来源和概括统计数据。[[31]](#footnote-31)
5. 如果所有国家都报告当前资金需求，就将为预测不同情景设想下的未来资金需求提供充分的依据。然而没有足够的直接需求观测值来建立一个好的预测模型。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首先需要估计未提交报告的国家的资金需求。为此，我们借助所报国内支出与所报资金需求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4）来估算缺失的国内支出，并以此为基础估算未报告国家的资金需求。随附的信息说明提供了整个分析的补充信息。
6. 因此过去需求是使用所报告的过去国内支出和资金需求以及上文概述的国家特性的过去值来估计的。下表显示使用这三个模型预测的过去国内支出和资金需求的聚合值。

|  |
| --- |
| **表. 三个模型估算的全球过去年度国内支出和资金需求总额**（百万美元） |
|  | **全球过去国内支出总额** | **全球过去资金需求总额** |
| MLR-1 | 117 685美元 | 150 223美元 |
| MLR-2 | 135 926美元 | 177 281美元 |
| PCA | 119 572美元 | 145 254美元 |

1. 为了估算未来资金需求，我们受IPBES《全球评估报告》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1和SSP5）的启发建立了三种情景设想（《全球未来》报告所用情景设想也是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我们的每一种情景设想都假设了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农业用地面积的具体增长率：
2. 在一切照旧设想中，未来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农业用地将继续以与过去有数据的10年（2008年至2018年）相同的平均速度增长；
3. 在可持续路径设想中，未来GDP预计将以过去10年观察到的相同平均速度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保持在2018年的水平，农业用地面积到2030年预计比2018年减少10%；
4. 在全面保护设想中，与其他两种设想相比，未来GDP增长率假设为过去10年平均增长率的一半，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农业用地面积到2030年比2018年减少30%。

补充文件中的表10总结了每种情景设想的假设和叙述性描述。

1. 一切照旧情景设想的预计全球资金需求，使用MLR-1模型估计每年3,060亿美元，使用MLR-2模型估计每年1,820亿美元，使用PCA模型估计每年1,510亿美元。可持续途径情景设想的预计全球资金需求与一切照旧情景设想相比平均变化不大（低9%）。使用MLR-1模型估计每年2,220亿美元，使用MLR-2模型估计每年1,750亿美元，使用PCA模型估计每年1,360亿美元。相比之下，全面保护情景设想的预计全球资金需求比一切照旧平均减少34%。使用MLR-1模型估计每年1,220亿美元，使用MLR-2模型估计每年1,690亿美元，使用PCA模型估计每年1,050亿美元。
2. 在一切照旧情景设想下—也就是说，如果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农业用地面积以目前的速率（2008-2018年的平均水平）持续增长到2030年——估计资金需求将比过去的需求水平亦即执行目前NBSAP的需求水平增加。相反，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全面保护情景设想）和农业用地减少（可持续路径情景设想和全面保护情景设想），大多数国家需要的资源会略少。在全面保护情景设想下，预计的资金需求甚至会低于过去的资金需求。然而考虑到Tobin和Waldron分别领导的研究小组提出的分析，在这一情景设想下机会成本可能会更高。下面图2是对三个模型的总结。

图1. **使用主成分分析模型（PCA）和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1, MLR-2）预测未来全球资金需求总额**

注：情景设想：GC=全面保护，SP=可持续路径，BAU =一切照旧。

1. PCA模型生成的估计数比两个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线性模型更为保守，应该比其他两个估计数更可信。PCA可用来解决预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和由此产生的估计误差。由于多重共线性的相关性，特别是考虑到GDP在情景设想构建中的作用，应谨慎解读MLR-1的结果。此外，PCA包括的国家特性组合比两个MLR模型多，MLR-2在步骤3中控制了石油租金。由于一些岛屿和小国缺失一些观测值（特别是石油租金变量），PCA和MLR-2预测的国家数量少于MLR-1。然而在MLR-1模型中，未被MLR-2或PCA估计数涵盖的国家的预计资金需求额仅占总额的一小部分（一切照旧每年18亿美元，可持续途径每年15亿美元，全面保护每年8亿美元）。
2. 财务报告框架中的国内支出和资金需求是自报的。原则上这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可能出于战略偏见而导致多报支出或未来资金需求。不过估计数字似乎比较适中。部分原因可能是NBSAP不能完整地反映一个国家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在全国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宏伟目标。提交报告的国家比未提交报告的国家的资金需求少（指占收入比例）。报告需求的高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多，生物多样性水平低的高收入国家的需求占GDP的百分比低于生物多样性水平高的低收入国家。我们还尝试将国家收入分类纳入模型，但发现这是一个与估算支出无关的因素。
3. 总之，根据这一分析，并考虑到上述方法上的问题，全球资金需求将从目前水平大幅增加，特别是如果世界继续走排放、生产和土地使用变化老路。然而如果世界走更全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例如通过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避免助长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奖励措施，那么未来可较少增加专门用于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每年在1,050亿至1,700亿美元之间。然而虽然这种向可持续道路的过渡也可能带来净经济节省，但考虑到这种变革的结构性障碍，实现这种过渡的政策措施也可能带来财务成本。

**六. 最终结果和讨论**

1. 鉴于上文讨论的各种报告使用的方法不同，本节试图澄清导致总体估计数不同的主要概念和方法差异:
2. 基于NBSAP的资金需求估计是保守的估计，因为使用的数据来自过去的财政资金，NBSAP可能无法涵盖一个国家的所有资金需求，总体上可能不如《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那么雄心勃勃，也不如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雄心勃勃。它包括对农业等最有可能损害生物多样性的经济部门进行更可持续的生产过程的潜在变化所产生的补偿付款，但这些补偿仅在已经“转化”为过去或计划的具体财政支出范围内。
3. 相比之下，《自然融资报告》中提出的资金需求估计数包括将关键经济部门（特别是牧场和农田）转为可持续做法的重大补偿成本。从真正的经济角度来看，这种补偿成本代表着机会成本，确实需要纳入经济分析，例如计算这种转型的最佳资金数额。[[32]](#footnote-32) 然而，专家小组的工作任务是评估一个雄心勃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可能产生的具体资金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产生了另外两个方法上的考虑。
4. 首先，虽然机会成本是相关的，但它们不一定会自动转化为需要提供同等数量的具体财政支付，以实现生产向更可持续做法的转变。这将取决于国内法律框架以及实际社会条件和相关的政治考虑和决策过程。[[33]](#footnote-33)
5. 第二，需要考虑有害生物多样性的补贴问题及其对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影响。除非去除这些补贴，否则社会不仅要承担转型的成本，还要承担导致依然存在的不可持续生产的补贴成本。只要有害生物多样性的激励措施和补贴持续存在，实现更可持续生产的补偿成本估计数仍会居高不下。因此，《自然融资报告》将取消补贴和改革确定为弥补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的主要来源。专家小组在其第一次和第三次报告中还强调必须减少或消除有害补贴并将其用于加强生物多样性。
6. 下图2旨在说明这些关于补偿成本作用的概念差异如何影响各种分析的标题数字。因此，根据《自然融资报告》，如果资金需求总额约为8,500亿美元，补偿成本约为4,500亿美元，则资金需求余额约为4,000亿美元。假设现有资金约为1,500亿美元，这将导致2,5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基于NBSAP的估计预测，在一切照旧的情形下，额外资金需求约为1,800亿美元，这意味着还有7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可能被认为没有被这一(相对保守的)估计所涵盖，例如，是由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更高的政策目标所导致的。
7. 一旦认识到每一项分析都是从稍微不同的一套假设和方法开始的，就可以看到它们是互补而不是相互冲突的。此外，环境署报告的结论认为，里约三公约每年需要4,030亿美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投资，这一结论与其他报告中的估计数相差不大。



**图 2. 财务成本与经济成本：补偿的作用**

**七．最终结果和讨论**

1. 本报告的主要讯息可概括如下:
2. 需要从所有来源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筹集更多资源。虽然过去十年中数据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数据仍显单薄，也不太可靠。然而尽管存在局限性和方法上的差异，但是从审议的不同分析包括专家小组本身的分析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需要有更多资源、需要监测进展情况并不断对其进行审查；
3. 最近的分析显示，采取高度定向保护措施，就财务成本而言，按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似乎并非昂贵得令人望而却步，而且可实现很高的投资回报或“物有所值”，显示出实现成本效益的良好机会；
4. 实现《公约》的所有三个目标，包括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经济部门的主流来实现可持续利用，成本更高，但同样从财务成本来看，以亿美元为单位，估计一个4位的低数字就够了；
5. 特定情景设想的结果再次显示更可持续和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途径带来的经济机会，在一切照旧的情景设想下资金需求更高。应记住，这里模拟的情景设想无法描述（因为还不知道）基于自然的解决办法在所有经济部门的全部创新潜力；
6. 考虑机会成本以及这是否和如何转化为具体的财务支出，又增添一层复杂性。最近的分析显示，机会成本可能很大，而且在要求大规模改变增长和生产模式的较高水平保护情景设想中，它们可能特别相关；
7. 并非所有地区都能从增加保护投资中获得同样的效益，也不会产生同样的机会成本。低收入国家最有可能获得最大效益，因此也是最需要投资的国家。改善融资机制，如全环基金及其增量成本推理的应用，可以通过调动更多资源来提高效率和投资回报。
8. 总的来说，由于数据不足和方法上的限制，估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生物多样性政策/方案/项目的投资回报或执行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当前资金需求具有挑战性。与十年前相比，数据有了很大改善，研究也有了很大扩展。然而如果没有更多更好的数据并进行更多的研究来了解自然的成本和效益，真正的挑战仍然是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影响、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宏伟目标所需的资源数量、《公约》缔约方应如何最佳利用所有可用资源。
9. 专家小组第一次和第三次报告在分析和结论中强调了最后一个方面，特别着力强调未来资源调动需采取三管齐下的办法：减少和转用有害生物多样性的支出，从所有来源增加资源，提高资源使用的成效和效率。三份报告都支持缔约方通过进一步发展NBSAP、国家报告、财务报告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统计，提高数据提供能力。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要高得多，但在生物多样性总支出中这些国家只占13%（占总保护支出的5%）。[[34]](#footnote-34)
10. 全环基金仍将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分配机制，并将在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发挥重要作用。2018-2022年期间全环基金为生物多样性拨款14.12亿美元，为核准项目的每一美元投资筹集了3至5美元。[[35]](#footnote-35) 自成立以来全环基金为155个国家的1,300个项目筹集了135亿美元，用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然而从全环基金第四次增资到第七次增资，为生物多样性提供的资金仅增加了约30%。此外，全环基金资金透明分配系统模式下的国家拨款主要由国家产生全球环境效益的潜力驱动。
11. 将提供一份关于在全环基金信托基金第八次增资期间执行《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所需资金的全面评估报告，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审议。评估报告以分析最新国家报告、NBSAP、财务报告为基础，同时考虑到专门为这次评估进行的问卷调查的答复结果。报告认为，全环基金第八次增资应该增加到至少16亿至37亿美元。最低预测是基于利用全环基金第七次增资和第六次增资拨款之间的变化对当前预算的小幅增加，而最高预测是利用一种统计方法估算的，其中纳入了缔约方通过问卷报告的资金需求，并对其余未提交报告的缔约方进行了推断。报告的结论是，当前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需要全环基金提供比以前预期的更大的财政支持。报告还建议，全环基金应该(a) 在为执行《公约》调动资源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它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发展努力的主流和确保有效利用资源方面也发挥作用，(b)加强对《议定书》的重视，(c)加强与绿色气候基金的联系，以促进为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多资金。
12. 专家小组第一份报告审视和评估了2011年至2020年的资源调动战略，其结论认为，资源调动战略的成效有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资源调动需要更具效率和成效，以弥合当前资源需求和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专家小组第三份报告提出了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调动资源的战略方法和建议，主张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调动资源应围绕三个关键组成部分:（a）减少或转用有害生物多样性的资源；（b）从所有来源筹集更多资源；（c）提高资源使用的成效和效率。本报告所作审视补充了这两份报告，表明增加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和转向更可持续和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路径可带来巨大的有益回报，把所有三个关键组成部分作为重心对于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

\_\_\_\_\_\_\_\_\_\_

1. 例如，根据经合组织支持农业（PSE数据库）和渔业（FSE数据库）的数据，经合组织国家仅有害农业和渔业生物多样性的支出估计就达1,070亿美元。再考虑到对化石燃料和水的使用/处理的支持，具有重大环境影响的补贴计划的总价值接近1万亿美元（见<https://www.oecd.org/env/resources/biodiversity/biodiversity-finance-and-the-economic-and-business-case-for-action.htm>）。这些估计数仅指政府的实际支出。例如，正如《2021年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论》所述，如果将外部环境成本和税收损失包括在内，有害激励措施的总额可能要高得多。 [↑](#footnote-ref-1)
2. 1996年至2008年，保护投资减少了109个国家（《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签署国）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平均每个国家减少29%（Waldron等，2017年）。Reductions in global biodiversity loss predicted from conservation spending. *Nature*, 551（7680）, 364-367）。 [↑](#footnote-ref-2)
3.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state-finance-nature>。 [↑](#footnote-ref-3)
4.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footnote-ref-4)
5.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同时又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提供惠益的行动。 [↑](#footnote-ref-5)
6. 第[XII/3](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2/cop-12-dec-03-zh.pdf)号决定，附件二。 [↑](#footnote-ref-6)
7. <https://www.wwf.org.uk/sites/default/files/2020-02/Global_Futures_Technical_Report.pdf>； <https://www.wwf.org.uk/sites/default/files/2020-02/GlobalFutures_SummaryReport.pdf>。 [↑](#footnote-ref-7)
8. Ref. No. SCBD/IMS/JMF/NP/YX/8870。 [↑](#footnote-ref-8)
9. 见<https://www.oecd.org/env/resources/biodiversity/biodiversity-finance-and-the-economic-and-business-case-for-action.htm>。 [↑](#footnote-ref-9)
10. 一切照旧情景设想，分别基于PCA和MLR-2模型（见第五节的讨论）。 [↑](#footnote-ref-10)
11. 专家小组谨感谢Anthony Waldron教授的启发性讨论，感谢Rishman Jot Kaur教授（印度理工学院卢尔基分校）、Emily Wise女士（怀俄明大学）和Bethany King女士（怀俄明大学）提供的宝贵研究协助。我们尤其感激Jot教授提出使用主成分分析（PCA）的想法，感激Wise女士和King女士的数据分析。 [↑](#footnote-ref-11)
12. 见 CBD/COP/14/5/Add.2。 [↑](#footnote-ref-12)
13. 设计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全球融资机制，*Conservation Letters*，2019;12:e12670. <https://doi.org/10.1111/conl.12670>。 [↑](#footnote-ref-13)
14. 这种融资机制可以激励各国通过保护区提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惠益。分析显示，将每个国家的保护区范围和其发展状况结合起来的社会生态设计将为距实现目标最远的国家提供最强的中位激励。 [↑](#footnote-ref-14)
15. 例如，见 <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events/Co-financing%20Incremental%20cost%202016-12-01.pdf>。 [↑](#footnote-ref-15)
16. 经合组织（2019年），生物多样性融资：为经济和企业采取行动。 [↑](#footnote-ref-16)
17. IPBES全球评估报告提出的五项干预措施是：（a）奖励措施和能力建设；（b）跨部门合作；（c）预防性行动；复原力和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决策；（e）环境法和实施。 [↑](#footnote-ref-17)
18. InVEST （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估价和权衡）是一套20个生态系统服务模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由Natural Capital Project开发（<https://naturalcapitalproject.stanford.edu/software/invest>）。 [↑](#footnote-ref-18)
19. 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是一个成熟且应用非常广泛的全球经济贸易模型。由普渡大学开发主办，涵盖140个地区/国家和所有关键行业部门（[www.gtap.agecon.purdue.edu/models/current.asp](http://www.gtap.agecon.purdue.edu/models/current.asp)）。 [↑](#footnote-ref-19)
20. Rozenberg等（2014年）的描述。Building SSPs for climate policy analysis: a scenario elicitation methodology to map the space of possible future challenges to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Climatic Change 122, 509-522。 [↑](#footnote-ref-20)
21. <https://www.campaignfornature.org/protecting-30-of-the-planet-for-nature-economic-analysis>。 [↑](#footnote-ref-21)
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the-economics-of-biodiversity-the-dasgupta-review>。 [↑](#footnote-ref-22)
23. 过去曾对是否将这一部分包括在有害环境补贴的定义中有过争论。经合组织或世贸组织使用的定义不包括外部经济影响的非内部化，因此产生了较低的估计值。 [↑](#footnote-ref-23)
24. 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全球资源评估高级别小组第二次报告（<https://www.cbd.int/financial/hlp/doc/hlp-02-report-en.pdf>）。 [↑](#footnote-ref-24)
25. 基于全球人口约70亿。 [↑](#footnote-ref-25)
26. Mangin T.等, 2018. Are fisheries management upgrades worth the cost? PLOS ONE. 13（9）: e0204258。 [↑](#footnote-ref-26)
27. UNEP/CBD/COP/11/INF/20。 [↑](#footnote-ref-27)
28. <https://chm.cbd.int/search/reporting-map?filter=resourceMobilisation>。 [↑](#footnote-ref-28)
29. PCA是一种降维工具，用于将一大组相关预测变量降为一小组相关性更小的变量，称为主成分，但仍然包含大组中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它可用来解决多重共线性。参见高级统计教科书和课堂讲稿，例如Perez, L. （2017）.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address multicollinearity”（手稿，见https://www.whitman.edu/Documents/Academics/Mathematics/2017/Perez.pdf）; Ringnér, M. （2008）. “What 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Nature Biotechnology*, 26（3）, 303-304。 [↑](#footnote-ref-29)
30. PCA寻找主成分多一个步骤。 [↑](#footnote-ref-30)
31. 见随附资料文件CBD/SBI/3/INF/5。 [↑](#footnote-ref-31)
32. 最佳转化率将由净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点来定义。假设利用成本和效益函数的标准曲率，向可持续性的转变应该发生，直到最后一公顷农业改造的社会成本(即所谓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这最后一公顷的社会效益(即边际社会效益)。这将提供应转型的最佳公顷数。只有当边际社会效益高到足以导致这种“角点解”时，才能实现100%的转型。 [↑](#footnote-ref-32)
33. 正如Waldron等人的分析所预见的那样，如果完全停止农业生产而将其转变为保护区，则更有可能需要全面补偿。 [↑](#footnote-ref-33)
34. James, A. 等. （2001）. Can we afford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OUP Academic, vol. 51, No. 1, <http://www.academic.oup.com/bioscience/article/51/1/43/251867.%2031>，<https://www.cbd.int/doc/strategic-plan/Post2020/postsbi/cfn.pdf>。 [↑](#footnote-ref-34)
35. <https://www.thegef.org/topics/biodiversity>。 [↑](#footnote-ref-35)